

第3课 民族和睦与中外交流

内容标准

以文成公主入藏、鉴真东渡、玄奘西行等史实为例,说明唐代民族和睦与中外文化交流的发展。

一、教学立意

通过了解文成公主入藏、鉴真东渡、玄奘西行等史实,认识唐代民族和睦与中外交流空前繁荣的原因。

二、教学目标

知道文成公主入藏、鉴真东渡、玄奘西行等史实。了解唐政权的民族政策与唐蕃关系。了解玄奘西行、遣唐使、鉴真东渡等史实,认识在经济、文化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唐朝采取鼓励对外交往的政策,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理解这些史实是以强大的国力与正确的民族和对外交往政策作为支撑才能出现的。

三、教材分析

1. 内容主旨

民族和睦与中外交流的繁荣源于唐朝强大的国力与正确政策的支持。

2. 主旨诠释

“贞观之治”开启辉煌,“开元盛世”达于鼎盛,唐朝历经百余年积累,国力强盛。由此,唐朝显示出了一种海纳百川的自信和开放、宽容的气魄。在民族交往上采取开明的政策,秉承“一视同仁”“爱华夷如一”的观念,维系民族和睦与边地安稳。文成公主入藏被视为佳话。在对外交往上,唐朝实行宽容、开放的政策。玄奘西行不仅繁荣了佛学,而且密切了唐朝与南亚、中亚、西亚之间的联系。同时,唐朝先进的政治、经济、文化辐射周边,吸引各国使节、学子、商人纷至沓来。鉴真东渡传播了盛唐文化,为中日人民共同敬仰。

3. 要点分析

本课由“文成公主入藏”“玄奘西行”“鉴真东渡”三目组成,为唐朝民族和睦和对外交往的重要史实。

第一目“文成公主入藏”以公主入藏为典型实例显示唐朝开明的民族政策。唐朝周边少数民族众多,分布各处。唐朝致力于改善民族关系,强调对待各民族一视同仁、以诚相待。文成公主入藏即是唐朝开明民族政策下的一段佳话。公主入藏带去了中原先进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加强了汉藏两族的联系,为西藏的经济、文化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第二目“玄奘西行”。要讲述玄奘西行,必须充分阐释丝绸之路在唐朝的全盛状况。汉通西域,开辟丝绸之路。唐驻军丝路,并先后在西域设立安西都护府、北庭都护府予以管辖,保证了这条沟通中西的重要陆上通道的安全与畅通,这是玄奘能够成功西行的重要背景。玄奘历时十余年在印度求取真经后回国,一生致力于经书的翻译和讲学,推动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玄奘的《大唐西域记》记录其西行所见所闻,具有较高的史学价值。

第三目“鉴真东渡”。唐朝时,一个以中国为中心、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也叫汉字文化圈或儒家文化圈)开始形成。日本先后十多次派“遣唐使”来华学习。鉴真东渡是中日交流史上的重要篇章,对唐文化东传日本作出巨大贡献。鉴真六次东渡日本,过程可谓艰险异常,但他却毫不畏惧,迎难而上,即使双目失明也没有放弃。这种精神是值得肯定的。

四、教学重点与难点

1. 重点

文成公主入藏、玄奘西行、鉴真东渡。

2. 难点

如何理解唐朝的民族政策。如何初步认识唐朝的对外交往及其路线、内容。

五、教学设计建议

设计一：课堂讨论法

导入新课

引导学生利用课前准备的相关资料(教师可根据学生情况自行安排)和教材内容等,在课堂上分组讨论。教师围绕如下主题,让学生打开思路,恰当的时候进行适当的点拨。

1. 文成公主入藏

提问:唐朝边疆地区主要有哪些少数民族? 指导学生观察课本“唐朝前期边疆各民族分布形势图”,简单介绍突厥、回纥(回鹘)、吐蕃、靺鞨等少数民族。

提问:唐朝政府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具有什么特点? 回答要点:平等、开明的民族政策,一视同仁,真诚相待等。

提问:唐蕃联姻说明了什么? 回答要点:松赞干布多次向唐求婚,说明吐蕃意识到了与唐王朝交往的重要性和吐蕃对中原经济文化的向往。唐太宗将文成公主远嫁,说明唐朝实行开明的民族政策。唐蕃联姻对加强双方友好关系,发展吐蕃经济文化有重大影响。

提问:唐朝政府为什么能够实行开明的民族政策? 回答要点:强盛的国力、先进的政治制

度、繁荣的经济、昌盛的文化带给统治者海纳百川的自信和开放、宽容的气魄。

2. 玄奘西行与鉴真东渡

实力强大的唐王朝不仅对内开明,对外亦实行宽容、开放的政策,对外交往全方位展开。(陆上)丝绸之路通畅全盛,玄奘西行;鉴真多次渡海赴日。这两件事情学生都有所了解。可从小说、历史故事、图像等入手引导学生讨论。

(1) 玄奘西行

提问:《西游记》中的主人公是谁?他们要去干什么?回答要点:唐僧师徒四人去往西天取经。西天指天竺,即现在的印度。经,指的是佛经。唐僧的原型系唐朝的玄奘大师。在学生回答的基础上,介绍玄奘西行的背景和成就。佛教产生于公元前6世纪,公元前3世纪开始向外传播,成为世界性宗教。佛教于西汉末期传入中国,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广为流传,隋唐进入鼎盛时期。不过唐初,佛教经义众说纷纭,难有定论。为辨真经,玄奘西行求取真经。贞观初年,他从长安出发,沿丝绸之路历经艰辛,最终到达印度,并游学多年。回国后,专心翻译经书,一生致力于佛教的传播。

提问:玄奘的哪些精神值得我们学习?西行意义何在?回答要点:玄奘不畏艰险、坚持不懈。西行促进了中国对佛学的研究,推动了中国与印度之间的了解与交往,加深了两个古老文明的接触与交流。

(2) 鉴真东渡

如果说玄奘西行是将佛教进一步引入中国,那么鉴真东渡则向域外传播了佛教。

提问:何为“遣唐使”?回答要点:遣唐使为7至9世纪时日本为了学习中国文化派遣的前往唐朝之使节。其间,日本先后向唐朝派出十几批遣唐使团。其次数之多、规模之大、时间之久、学习内容之丰富,可谓空前(可为学生讲解日本留学生阿倍仲麻吕的故事)。日本在文字、服饰、建筑、习俗等多方面受到中国深刻的影响。鉴真东渡即在此背景下出现。

请学生讲述鉴真东渡的故事。鉴真(688—763年)江阴人,俗姓淳于。原为扬州大明寺高僧,精通佛经和医学。日本僧人荣睿、普照等曾邀请他去日本,他先后五次东渡,均未成功。753年,已双目失明的鉴真带着弟子第六次东渡,到达日本。他带去佛教经典,并传授了建筑、雕刻、医学等知识,对促进中日文化交流和日本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鉴真在日本十年,深受日本人民的崇敬,死后葬在日本的唐招提寺。

小结

民族关系和对外交往的全方位发展是唐朝国力强盛的表现。一个国家只有自身强大起来,才能赢得真正的尊重。开放、交流,取长补短是国家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条件。

附:板书设计

第3课 民族和睦与中外交流

边疆:开明的民族政策——文成公主入藏⇒包容

世界: { 西:玄奘西行(印度、输入) } ⇒开放
 { 东:鉴真东渡(日本、输出)

设计二：图片教学法

利用教材所提供的图片,引导学生了解图片背后的时代。如注意“唐朝前期边疆各民族分布形势图”中少数民族的分布,关注哪些民族与唐接触频繁(战争、和亲),哪些民族在之后的历史发展中有着不平凡的经历,甚至建立强大的王朝;观察《步辇图》中所绘人物的比例,思考为什么会这样画(可从作者的立场等入手);关注“玄奘画像”的人物服饰,了解民俗;探讨“鉴真坐像”的艺术风格,从侧面理解唐朝对日本的影响。

六、习题分析

1. 课外学史

此题目的目的是在课后培养学生查找资料的能力。有关西藏的读物很多,在让学生自由查找、阅读的过程中,教师可适当根据学生的年龄层次推荐更易理解、阅读的读物。可以通过小说(如《格萨尔王》等)、关于西藏的纪录片等去了解西藏的风俗人情。有条件的学校可以让学生上网查阅,并进行交流。

2. 思考与讨论

史书中关于玄奘西行的记载可以反映历史事实。《西游记》则在玄奘西行事迹的基础上,融合民间传说和民间宗教故事,加上作者的想象,虚构出很多生动多面的艺术形象。《大话西游》更是在《西游记》的基础上以夸张、戏说的方式呈现一个内涵完全不同的故事。《西游记》反映的是明代人对宗教、人生和社会现实的看法。而《大话西游》则是借用《西游记》中的人物形象反映现代人对爱情和生命的看法。三者是完全不同的。

历史小说、影视戏说作品,一定程度上可以激发人们对历史的兴趣,拉近现代人与历史人物的距离。但如果完全歪曲了历史事实,其负面效应也是显而易见的。一般人平时接触真实、专业的历史知识的机会并不多,他们很容易把经过艺术加工的内容当作真实的历史,从而影响他们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认识与评价。所以教师应该在课上结合一些当下的热点,让学生们在课堂上各抒己见、合理想象,并帮助学生学会如何分辨历史史实与历史戏说之间的区别。

七、课文注释

1. 唐初的民族关系

自魏晋南北朝以来,北方、东北和西部的少数民族不断入居中原,而中原百姓也有不少移居到少数民族地区,长期的“胡汉杂居”,促进了民族间的交流和了解。到了唐代,民族间的联系、融合明显加强。唐朝国力强盛,先进的政治制度和繁荣的社会经济,为边地民族所慕风向化。所以,在唐初,政府采取一种更加开明的民族政策。民族关系处理方式的开放、宽容,显示出一种容纳百川的自信和气魄。唐太宗曾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他认为,对夷狄不

能妄加猜忌,而要多想想能否给他们带来恩泽。“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这种“华夷一体”,一视同仁的民族观念为前代君主所未有。

正是在这种思想观念和政策的指导下,贞观年间,除了征服东突厥外,中央政府很少主动发起大规模的战事。东突厥之患,也在唐朝建国十多年以后,才大动干戈,以求彻底解决。在此之前,大体采取克制的态度,甚至“倾府库赂以求和”。对于那些被征服的,或主动归附的少数民族、部落,唐太宗采取较为温和的羁縻政策,不强行改变他们原来的生活方式,仍以他们原来的酋长为都督来统治、管理原来的地区和人民。唐政府还常常以宗室女嫁各部落酋长,结成亲戚关系,加强他们与唐朝的联系。许多少数民族的酋长、部落首领被允许在长安任职,有的是军中的重要将领,有的甚至在皇宫的禁军中任职。如东突厥的首领在京城任将军、中郎将等职的有500余人,五品以上的官员也有百余人。许多少数民族人士在朝廷做官,有些还担任宰相、大将军、节度使等重要官职。据统计,唐朝宰相共有369人,其中少数民族人士为24人。唐德宗时,政府部门经清查发现,历年来西域诸国使臣至长安而未归者达4000多人,政府原打算将他们遣返本土,但没有一个人愿意回去,且到政府衙署申诉。原来他们久居长安,已经娶妻生子,置办田宅,有的在长安已生活了40余年。于是,政府只得让他们到鸿胪寺去登记,成为唐朝的编户百姓,入伍到神策军中成为唐禁军的士兵。这种情况在历代汉人建立的王朝中是较为罕见的。

唐太宗的这些民族政策,对于缓和民族矛盾、密切民族联系有着巨大的影响,促成了边地民族对中原王朝的归附。据史料记载,贞观四年(630年),突厥前后内附的(包括部分被突厥掠为奴隶的汉人)达120余万口。贞观六年(632年),党项羌前后内附的达30万口。边境的安定,带来了民族间的频繁交流,中原地区汉民族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传入少数民族地区,对当地的开发和社会进步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据考古发掘,在西域耆焉地区,发现了小米、高粱、麦粉、胡麻等作物,还有石碾磙、铁犁、铁镰等生产工具。在龟兹地区,发现了长达百里的干渠遗址以及管理水渠的官方文书。传入少数民族地区的还有茶、绢等物品。一些少数民族在与汉民族的交往中,逐渐改变了他们原先的生活方式,如回鹘人在中原文化的影响下,逐步由游牧生活方式转变为半定居、定居生活方式,并开始修建城市、建筑宫殿等。文成公主入藏,为吐蕃带去了大量的生活用品、医药、生产工具,以及经史、诗文、工艺、历法等书籍。唐高宗、玄宗时还派去了酿酒、制碾、造纸墨的工匠以传授技术。与此同时,少数民族的一些生产技术和文化也传入了内地。唐政府每年要从少数民族地区输入大量的马、牛、羊等牲畜,以满足军事、交通和农业生产需要。西域的贵族、僧侣、乐工和画师等大量涌入内地,他们在长安定居下来,或购置地产,或开设商铺,不少人和汉人通婚,或以他们的技艺谋生。于是,西域不同风格的音乐、舞蹈和绘画等在内地广泛流传,并给唐代文化艺术的发展输入了新鲜血液。

2. 唐朝民族分布及各民族间的关系

唐代,众多活跃的周边民族之中,与中原地区交往比较密切的有:突厥、回鹘(回纥)、吐蕃、吐谷浑、靺鞨、契丹、南诏等。

突厥:突厥是6世纪时在中国北方、西北方兴起的操突厥语的民族,也可以指突厥民族在6

至8世纪建立的汗国的名称。突厥源出铁勒,铁勒在战国、秦汉时称“丁零”,北魏时称“高车”或“敕勒”。其最初的活动地在准噶尔盆地之北,约在今叶尼塞河上游,后迁移至高昌之北,再迁移至金山(今阿尔泰山的南麓)。6世纪中叶,突厥建立汗国,其后,突厥势力渐强,并向南发展。南北朝后期,北周、北齐相互征战,都曾与突厥结好以自强。隋代北周时,突厥内部发生权力斗争,最终于583年分裂为东、西二部。

东突厥曾与隋朝结好。至隋朝末年,中原战乱,各地割据势力如薛举、王世充、刘武周等都与东突厥交好,以为声援。唐高祖李渊太原起兵时,也曾向东突厥称臣,以换取他们的支持。自隋末至唐初,东突厥不断南下骚扰,甚至进兵长安附近,对中原王朝构成一大威胁。贞观三年(629年),乘东突厥内乱以及天灾,唐军数路出击,于次年击败东突厥军队,东突厥(第一汗国)败亡。东突厥败亡后,其降户由唐政府安置在灵州(今宁夏灵武)至幽州(今北京)之间的区域,设都督府进行管辖。唐高宗时,东突厥残部乘唐廷内部纷争无力北顾,聚众反叛,建立突厥后汗国(第二汗国)。至744年,其余部被新崛起的回纥势力所破,后汗国灭亡。西突厥内部长期纷争。唐高宗显庆二年(657年),唐军将西突厥击败,在其地设置都督府进行统治。

回鹘(回纥):回鹘也是生活在中国北方、西北方的操突厥语的民族之一,关于回鹘人的起源,学术界有源于匈奴说、突厥说等不同看法。唐天宝三年(744年),回纥与其他势力联合击败了东突厥,尽占东突厥故地,并建立回纥汗国。回纥汗国初起之时,与唐朝修好,接受唐朝的册封,双方保持着密切的交往。其时,回纥深受唐文化的影响,其生活由游牧为主向半定居转化,上层统治集团开始营建城市、宫室。“安史之乱”以后,唐政府向回纥求援,回纥开始大规模南下,协助唐政府收复长安、洛阳等地。作为回报,唐政府馈赠大量的财物,开放绢马互市,回纥势力得以很快地发展。8世纪末,回纥改名为回鹘,其势力向西扩张,远达真珠河(今锡尔河上游纳伦河)及拔汗那(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一带。至唐文宗开成末年,回鹘被黠戛斯(唐时生活在回鹘西北约今叶尼塞河上游地区的民族)所灭,汗国灭亡,部众也四散逃亡。

吐蕃:吐蕃是今日藏族的祖先,也可指7至9世纪在青藏高原建立的边疆民族政权。关于吐蕃的起源,学术界有很大的分歧,有源于西羌说、印度说、鲜卑说等不同看法。通常认为,东汉时有诸多西羌部落先后进入今西藏地区,逐渐与当地的土著民族融合。至隋时,在今西藏和青海西南等地分布着许多羌人部落和政权。其中,牦牛部落所建立的吐蕃政权实力最强。隋末唐初,吐蕃政权逐渐统一了青藏高原,定都逻些城(今拉萨)。贞观八年(634年),吐蕃遣使与唐朝通好。贞观十五年(641年),太宗以宗女文成公主出嫁赞普(吐蕃国王),自此唐蕃结甥舅之好。

吐谷浑:吐谷浑原是鲜卑慕容部的一支,西晋初年,游牧在今辽宁锦阳西北一带。约在晋武帝太康年间,酋长吐谷浑因与其弟发生争执,愤而率部众千余人西迁。先迁至今内蒙古阴山地区,后再迁到枹罕(今甘肃临夏)。至南北朝后期,其势力大为扩张,统治着今青海、甘肃和四川西北地区的羌、氏等族,并建立国家。于是,以鲜卑和诸羌为主体,综合境内其他民族,逐渐形成了吐谷浑民族。吐谷浑既为姓氏、族名,又是国号。

隋朝建立以后,炀帝为打通西域交通,在大业五年(609年)大举进攻吐谷浑,在其地设置西海(今青海湖西)、河源(今青海兴海东南)等郡。隋末中原大乱,吐谷浑乘机复国,又尽复其故地。唐初,吐谷浑一方面贡使不断,一方面又连年在边地骚扰。贞观九年(639年)太宗派李靖率军将

其击溃，吐谷浑首领被部下所杀（一说自尽），不久，太宗册立其新可汗，并以宗女弘化公主妻之。唐高宗时，吐蕃势力向外扩张，龙朔三年（663年），吐谷浑大臣叛逃吐蕃，泄露吐谷浑虚实，于是吐蕃发兵征服了吐谷浑。吐谷浑亡国后，其地全为吐蕃所占，留在本地的吐谷浑人为吐蕃所奴役，部分迁入唐境内。

靺鞨：靺鞨是隋唐时期活跃在中国东北部的一个民族，先秦西汉时称“肃慎”，东汉魏晋时期称“挹娄”，南北朝时称“勿吉”，隋唐时称为“靺鞨”，他们是五代以后女真族的先民。靺鞨族部类繁多，分布甚广，处于南端的粟末部与北端的黑水部最强。

粟末部居粟末水（今第二松花江）流域，因接近隋唐的边州，与隋唐的关系最为密切。隋时，首领突地稽率部千余户降隋，移居营州（今辽宁朝阳），逐渐同当地汉人融合。留在故地的粟末人及其他诸部先后沦为高丽的附庸。唐灭高丽后，这部分粟末人同激烈抗唐的高丽遗民数万人一道被迁居于营州附近。武周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契丹攻据营州，粟末人与高丽遗民趁机回归故土，其中在粟末首领大祚荣统率下的一部东渡辽河，到达靺鞨故地，于698年在东牟山（今吉林敦化东北）和奥娄河（今牡丹江上游）一带建立了震国。初，震国为防备唐廷的讨伐，曾不得不依附于突厥。神龙三年（707年），唐廷派侍御史张行发招抚大祚荣，双方和解。先天二年（713年），唐册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为唐廷番臣。宝应元年（762年），第三世王大钦茂被晋封为“国王”后，渤海与唐廷关系更为亲密。此后，渤海历世诸王都经唐廷册立，终唐之世遣使朝唐一百数十次。其间除大武艺之世一度与唐发生军事冲突外，渤海对唐始终亲好。唐亡后，渤海继续向后梁、后唐朝贡，对其保持着臣属关系。渤海国历15王，约229年。渤海的疆域，初限于靺鞨的部分故地，“方二千里”。经过大祚荣、大武艺父子两代的扩充，领地逐渐扩大。第十代宣王大仁秀被称为渤海国中兴之主，他广开土宇，南定新罗，北略诸部，境宇至“方五千里”，大体上南至泥河（今朝鲜咸镜南道龙兴江），东到日本海，东北至乌苏里江下游，北隔那河（今松花江）与室韦（中国古代东北民族）相望，西抵扶余川（今吉林伊通河）流域与契丹接壤，西南同唐交界于辽河流域，包括今东北大部、朝鲜半岛北部及俄罗斯沿日本海的部分地区等广大地域。居民以靺鞨人最多，高丽遗民占有一定的比例，还有汉人以及少量的突厥、契丹、室韦人，靺鞨中又以粟末靺鞨为主。建国初期有编户10余万，人口数10万，后期人口逐渐增至300万左右，从而获得了“海东盛国”的称誉。

地处北端的黑水部也是靺鞨族部中较强的一部，开元十年（722年），唐政府任命黑水靺鞨的首领为勃利州（今俄罗斯伯力）刺史。开元十三年（725年），唐朝在黑水靺鞨地置黑水军。后又置黑水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归营州都督统辖。

契丹：契丹也是隋唐时活跃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一个民族。契丹源出东胡系鲜卑宇文氏，活动在潢水（今内蒙古西拉木伦河）至黄龙（今辽宁朝阳）之间。突厥强盛时，契丹臣服于突厥。隋唐时期，为摆脱突厥役属，契丹开始“背突厥”附隋唐。唐政府设置松沙都督府和10个羁縻州进行管辖，并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此后，唐与契丹既互有交往，又常有冲突。唐政府为了防御契丹，加强对东北边防的兵力，设范阳、平卢两节度使，重用胡人安禄山，最终导致了“安史之乱”。回鹘崛起之后，契丹一度受制于回鹘。9世纪中叶，回鹘衰落后，契丹又归顺于唐。唐末五代时期，契丹重新崛起，其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诸部，势力不断扩张。916年，阿保机建国称王，国号契丹，后改为辽。到北宋时，形成了契丹的辽国与北宋、西夏三国对峙的局面。

南诏：南诏是649年至902年在中国西南地区由“乌蛮”与“白蛮”联合建立的一个边疆民族政权。有关乌蛮、白蛮的起源及其与后世民族的关系，学术界尚无定论。通常认为，他们是今彝语支各族的先民。在隋唐时期，在今云南大理的洱海周围及哀牢山、无量山北部地区，分布着乌、白蛮的众多部族和部落。其中有六个势力最大的乌蛮部落，分别为：蒙舍诏、蒙嵩诏、濛巂诏、越析诏、浪穹诏、施浪诏，史称“六诏”（诏，即王的意思）。蒙舍诏地处最南，故也称南诏。唐玄宗时，蒙舍诏首领皮罗阁在唐朝的支持下，统一了六诏（统一后的政权仍称南诏），迁都大和城（今云南大理南太和村）。唐支持南诏统一，目的是牵制吐蕃，但也为南诏的向外发展提供了条件。“安史之乱”以后，南诏乘机扩展疆土，控制了今四川大渡河以南，包括今四川西南部、云南全部及贵州西北部的广大地区。9世纪中叶，吐蕃政权瓦解，唐朝国力也渐趋衰落，南诏对唐边境的侵扰十分频繁，成为晚唐最严重的边患。9世纪末期，南诏内部权力纷争最终导致政权瓦解。

关于唐朝政府与周边各族势力之间的相互关系，历史学家陈寅恪有《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一文作了专门的叙述。陈寅恪先生认为：“所谓外族盛衰之连环性者，即某甲外族不独与唐室统治之中国接触，同时亦与其他之外族有关，其他外族之崛起或强大可致某甲外族之灭亡或衰弱，其间相互之因果虽不易详确分析，而唐室统治之中国遂受其兴亡强弱之影响，及利用其机缘，或坐承其弊害，故观察唐代中国与某外族之关系，其范围不可限于某甲外族，必通览诸外族相互之关系，然后三百年间中国与四夷更叠（迭）盛衰之故始得明了，时当唐室对外之措施亦可略知其意。盖中国与其所接触诸外族之盛衰兴废，常为多数外族间之连环性，而非中国与某甲外族间之单独性也。”比照上文所述的唐朝与南诏、唐朝与突厥及吐谷浑之间的关系，陈先生的概述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3. 唐代的羁縻州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央王朝对周边地区的开发以及对周边少数民族的政策，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其中，汉代和唐代，各自代表着前后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汉时，边疆民族相对比较单纯，强大的只有一个匈奴，其他民族大都还不甚发达，有些还处于原始社会状态。所以，汉代的民族政策虽然也有和亲等，但主要还是徙民实边，即将大量的人口迁徙到边地，在那里建立一些军事、农垦基地，以此开发边地，并求得边地的安宁，防范和减少北边其他民族对中原地区的骚扰。经过汉以后几百年的发展，到隋唐时期，边疆各族的经济已有长足的进步，人口也大为增加，许多民族已经进入到阶级社会，并建立了他们自己的国家或政权。从历史文献（《唐书·地理志》）的记载来看，唐时边疆地区的户口比汉时大为减少，这不是因为那些地区的人口减少了，而是唐朝政府所能控制的户口，尤其是汉人减少了。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如仍然施行前代的徙民实边政策，势必难以起到效果，甚至还会被边疆他族吞没。历史条件发生了变化，相关的政策方针也必然随之有所调整，这便是唐朝羁縻政策产生的历史背景。

唐时，中央政府对周边民族采取一种更为宽松的民族政策。羁，即马笼头；縻，即穿在牛鼻上用上来牵引的绳子。“羁縻”两字，原是牵制的意思，喻意为联络、维系。所谓羁縻政策，就是以怀柔的姿态，保持彼此间的联系使其不至于绝尘而驰的一种民族政策。其具体措施甚多，如册封、和

亲、互市以及其他优待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办法。唐时,在周边从事游牧生活的民族内降之后,中央政府按照内地久已通行的制度,在他们的疆土上设置州县,并设置都督府以统辖所设的州县。所设置的都督府和州县,一般都由本部落的人来担任都督、刺史、县令等,并可以世袭,政府一般不过问其内部庶政,而采取“全其部落,顺其土俗”的政策。这种统治边远民族地区的地方行政机构称羁縻州,以区别于内地的州县。羁縻州是唐代羁縻政策在地方行政区划上的体现和创新,它的建立体现了一国多制的精神和唐代开明的政治特色。

唐代在周边少数民族内附部落中设置的羁縻州,包括羁縻都护府、都督府、州、县四级,习惯上总称羁縻州。唐高祖武德年间,中央王朝曾在今四川、云南和贵州境内设置过这类州县,只是当时并无羁縻州的名称,也没有将它们与普通州县作明显的区别。至唐太宗贞观年间,由于大量设置这一类州县,所以才有羁縻州的定制。羁縻州又称“番州”,与之相对的内地普通州则称“正州”,不过,在内附部落设置的州也有被列入正州的,其间并没有十分严格的界限。

唐代羁縻州只是名义上的行政区划,其版籍并不向唐朝政府呈报,也并不承担一定的贡赋。有少数羁縻州的版籍要上报户部,也有少数羁縻州“愿纳赋税”,但比正州要轻,也没有定额。羁縻州普遍对唐天子有所贡献。在行政隶属上,都督府有领州的,也有不领州的,州也有领县和不领县的分别。羁縻州的建置常常因时因地而异,如北边,太宗、高宗时的许多府州,设置了不久即告废弃,而岭南道的一些府州迟至大历、贞元时才设。唐代有十道,其中九个道都设置过羁縻州,只有淮南道没有羁縻州。唐代羁縻州大致以唐初至玄宗为盛,中唐之后逐渐转衰,各地的建制也因时因地相异而有所不同,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在边地本土设置的羁縻州。如契丹内附之后,唐在契丹故地设松漠都督府及十州。第二,边族移入内地所设置的羁縻州。这种州寄属于唐正规州县境内,也称侨番州。第三,有些边州时而由正州降为羁縻州,时而由羁縻州上升为正州。第四,有的羁縻州仅在唐初或某一时期在唐政府的有效控制之下,不久即背唐独立或为邻近民族政权所占领;也有的羁縻州自始至终仅是虚名。通过羁縻州的建制,唐朝政府得以推行一系列怀柔政策,提高了政府的威望,加强了中央政府与周边民族的友好关系,对促进唐代各民族的交融和各地区经济文化的交流发展具有特殊的意义。

4. 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

松赞干布(约617—650年),又称弃宗弄赞或弃苏农,吐蕃的赞普(王)。松赞干布出身吐蕃贵族,相传他的始祖弃聂器赞是天神之子,担任过吐蕃六施牛部的首领。大约从吐蕃第十七代赞普起,吐蕃开始设置大论(宰相),辅助赞普统理国事,出现了国家政权机构。从松赞干布的六世祖弃脱赞开始,吐蕃赞普才有确切的世系记载。大约在6世纪下半叶,松赞干布的祖父诃素若定都匹播城(今西藏琼结),并相继统一了邻近各部,与北面的苏毗和西面的羊同,并立为西藏高原的三强。

隋大业十三年(617年),松赞干布生于吐蕃旧都的王宫,他的父亲朗日论赞是吐蕃赞普。传说松赞干布年轻时便精通骑射、角力、击剑等武艺,爱好民歌,擅长吟诵,是个文武双全的王子。

13岁时(一说12岁),他父亲在内乱中被叛臣毒死,叛臣又勾结苏毗、羊同向吐蕃发起进攻,并占据了吐蕃王国的大片领土。松赞干布在叔父和亲信大臣的拥戴下,继承赞普,削平了叛乱,阻止了苏毗、羊同诸国的进攻。不久,松赞干布决定迁都逻些(今西藏拉萨),并派人在布达拉山修建王宫,构筑城堡。新都城位于吉曲河(今拉萨河)下游,这里地势险要、地域开阔,位置适中,周围有大片的农田,而且原野秀美,北面有念青唐古拉山作天然屏障,地理形势上的优越性使得新都城很快成为吐蕃的政治中心。633年,松赞干布把都城迁到逻些,许多原先依山而居的部落也随之迁徙到平原上居住,他们逐渐由原来的游牧变为定居放牧,更多的人开始从事农耕生活。迁都逻些,促进了吐蕃社会经济的发展,平原上出现了大片的农田,牛羊遍野,马匹肥壮。

吐蕃国力的逐渐强盛,为松赞干布统一青藏高原奠定了基础。其时,在吐蕃北面的诸羌中,以苏毗最为强大。松赞干布派宰相尚囊统兵出征苏毗,采取武力与招抚相结合的策略,迫使苏毗投降。苏毗投降后,原先位于苏毗以东的多弥、白兰、党项诸部也先后臣服于吐蕃,吐蕃的北疆扩展到今青海的南部。在出兵征战苏毗的同时,松赞干布亲自统兵出征位于吐蕃西南的羊同。面对强大的吐蕃军队,羊同王不得不缴械投降。为了笼络羊同王,松赞干布把自己的妹妹塞玛噶嫁给他。不久,羊同王因不甘奴役而反叛。644年,松赞干布再次发兵攻入羊同,羊同王被杀,其部众全都归附吐蕃,成为吐蕃的编民。至此,松赞干布最终完成了对整个西藏的统一。

吐蕃各部很早就与中原地区有密切的联系,朗日论赞时,中原的医药、书籍就已经传入吐蕃。松赞干布为赞普后,对中原文化十分仰慕,贞观八年(634年),他派使臣入唐,请求通好。当时,唐朝正准备出兵征讨吐谷浑,也希望与吐蕃建立友好关系,故对吐蕃的首次通使极为重视,立即派冯德遐为使者带着国书和礼物到吐蕃报聘。冯德遐来到逻些后,受到隆重的欢迎和接待。当松赞干布从唐朝使者那里得知突厥、吐谷浑等首领都已经娶唐朝公主为妻时,立即派遣使臣携带大量的金银珠宝,随冯德遐一起入朝,向唐朝求婚。唐时,很多边疆少数民族的国王或首领都向唐朝求婚,把迎娶唐朝公主看作是一种特殊的恩典和荣誉。如唐太宗曾把皇妹衡阳长公主许配给突厥首领阿史那社尔,把弘化公主下嫁给吐谷浑的首领诺曷钵。贞观初年,由于对吐蕃的情况不甚了解,太宗没有答应松赞干布的第一次求婚。吐蕃使者回去后,因没有完成求婚的任务而难以向松赞干布交代,便编造谎言说:唐天子原先对使臣甚好,而且答应许婚。只是由于吐谷浑诺曷钵到来(当时吐谷浑的首领诺曷钵确实也正好在长安朝见),从中离间,求婚才遭破坏。松赞干布听了大怒,马上征调军队对吐谷浑发起进攻。诺曷钵不能抵挡,只得逃到青海湖以北,其牲畜和百姓多为吐蕃所掠。

贞观十二年(638年),松赞干布率20万大军进攻松州(今四川松潘),唐松州都督韩威领兵抵挡,被吐蕃军击败,原先已经归降唐朝的两个党项部落也归附吐蕃。同时,松赞干布又派遣使者到长安进贡,再次求娶公主。他向部下扬言:如果唐朝再不许嫁公主,就将兵攻入。同年八月,唐太宗任命吏部尚书侯君集为行军大总管,统兵五万分四路出击吐蕃。唐军前锋抵达松州后,乘其不备,发动夜袭,吐蕃大败。松赞干布只得引兵撤退,并派遣使臣禄东赞前往唐朝谢罪,并又一次恳请许婚。太宗考虑到吐蕃为西陲强国,为了确保边境的安宁,允许了他的求婚。使臣禄东赞回到逻些,向松赞干布报告了唐朝的许婚。松赞干布大喜,立即准备了丰厚的聘礼——黄金5000两,珠宝珍玩数百件,仍以禄东赞为使臣到长安纳聘,唐太宗终于答应把宗室女文成公主嫁

给赞普。禄东赞在长安逗留了三个多月,对中原风物的繁华大为赞叹。他机智聪明,言谈得体,深得太宗的喜欢,太宗想把琅琊公主的外孙女段氏许配给禄东赞。禄东赞上奏说,自己已有妻室,不可遗弃,况且这次是为赞普迎亲,赞普尚未会见公主,自己怎能先娶?禄东赞后为吐蕃大相。高宗永徽元年(650年),松赞干布死后,其孙继位。因新赞普年幼而由禄东赞主掌国政。禄东赞当政时期,安抚边地,制定赋税、法律,清查户籍,对吐蕃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有一定的贡献。

文成公主是唐宗室之女,可能是唐太宗的族弟江夏王李道宗的女儿。文成公主是一位有才识且端庄的女子,自幼受过良好的教育。她熟读经史诗文,通达礼仪,还信仰佛教,诵读过不少佛教经典。订婚后,文成公主便积极准备奁妆,她还召见禄东赞,向他了解吐蕃的地方气候、物产和风土等情况。在准备的奁妆中,除了有大量的金银、绸帛、珍宝外,还有大批儒家经典、史书、名家诗文、佛教典籍,以及有关种植、医药、历法、工艺技术等的书籍。她还特地精选了一些耐寒抗旱的芜菁(一种一年或二年生的草本植物,根和叶可作为蔬菜,也可作为饲料)和其他谷物的种子,准备到吐蕃地区试种推广。

贞观十五年(641年),文成公主由江夏王李道宗护送,率领庞大的随行人员和车队,从长安出发。松赞干布则亲自到柏海(今青海札陵湖)迎候。迎亲仪式结束以后,李道宗回朝复命,由于道路险阻,松赞干布先起程回逻些,文成公主带来的汉族工匠也先行出发,与吐蕃人民一起为公主平整道路,开设驿站,开通一条连接唐蕃的驿道。文成公主到达逻些后,受到吐蕃人民的盛大欢迎,婚礼成了吐蕃人民的欢乐节日。松赞干布激动地对他的臣下说:我的祖上从来没有与中原上国通婚的先例,现在我能娶大唐公主为妻,真是太幸福了。为了进一步学习中原的先进文化,松赞干布仿效唐朝建制,制定了官阶品级制度,并在地方上建立兵制和官制结合的地方组织。松赞干布还向唐朝求取蚕种,以及酿酒、建筑方面的工匠等。同时,还挑选一些吐蕃贵族子弟到唐朝长安国学中学习,开启了学习唐朝文化的风气。松赞干布在位20年,为藏汉民族的友好往来作出不少贡献。

高宗永徽元年(650年),34岁的松赞干布在盛年时去世。松赞干布去世以后,文成公主并没有要求回唐朝,继续留在吐蕃生活了30年。其间,唐朝与吐蕃曾一度失和,发生战争,但吐蕃人民对她仍尊敬如故。680年,文成公主去世,当地的人们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5. 阎立本与《步辇图》

阎立本(?—673年),雍州万年(今陕西临潼)人。其父阎毗为北周驸马,入隋后曾任殿内少监,擅长工艺、书画、建筑。兄阎立德,也精于书画、工艺和建筑,主持营建献陵(唐高祖李渊的陵墓)、昭陵等工程。阎立本继承父业,尤其精于绘画。贞观年间,相传太宗曾与学士在春苑泛舟游览,水池中忽然出现一大群各色飞禽,追逐嬉戏,景色壮观。太宗急诏阎立本前来写生作画。阎立本奉诏急驰,到了苑池,不顾浑身汗水,立刻泼墨作画。事后,阎立本曾告诫儿子不要像他那样学绘画这类雕虫小技。他说:我年少时也曾喜欢读经史之书,但后来却潜心丹青,执著于画道。所以只能以此见知,做一些厮役、奴仆所做的事,真是莫大的耻辱。你应该引以为诫,千万不要学

这种雕虫小技。唐高宗显庆年间，阎立本代其兄任将作大匠，不久，又任工部尚书。总章元年（668年），阎立本升任右相。阎立本只擅长绘画，并无宰相的才能，而当时任左相的姜恪也是一介武夫，仅以战功而获取相位。时人所编的《千字文》中有：“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驰誉丹青”二句，说的就是他俩。

阎立本的画技师承张僧繇和郑法士，而能“变古象今”，富有创新。阎立本工人物、山水、鞍马、台阁，尤以道释人物的写真而著称。曾奉诏为唐太宗画像，又曾在长安慈恩寺两廊画壁，颇受时人赞誉。所绘的《秦府十八学士图》系唐太宗属下的房玄龄、杜如晦等十八文人谋士的肖像画，都按人写真，画卷中对每人的身材、相貌、服饰、年龄、神态均有生动具体的刻画。贞观十七年（643年），阎立本奉诏画长孙无忌、魏徵、房玄龄、杜如晦等二十四功臣像于凌烟阁，这是继西汉麒麟阁、东汉云台画功臣像之后的又一次政治性肖像画创作活动。唐代画像早已不存，宋时画家游师雄依据流传摹本摹刻上石，石刻现存于陕西麟游县，尚有萧瑀、魏徵、李绩、秦叔宝四像部分石刻，皆全身执笏肃立，可惜面部形象已经残毁。存世的《历代帝王图》《步辇图》《职贡图》等，相传是他的作品或摹本。其中《历代帝王图》为阎立本人物画代表作，此图纵51.3厘米，横531厘米，画古代13位帝王形象（西汉昭帝刘弗陵、东汉光武帝刘秀、魏文帝曹丕、吴主孙权、蜀主刘备、晋武帝司马炎、陈文帝陈蒨、陈废帝陈伯宗、陈宣帝陈顼、陈后主陈叔宝、北周武帝宇文邕、隋文帝杨坚和隋炀帝杨广）。每个帝王均有标名。画家根据每个帝王的政治作为和不同的命运，对其加以个性化的描绘，体现了作者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全图线条挺拔有力，色彩凝重，具有相当高的艺术水平，现藏于美国波士顿美术博物馆。

贞观十四年（640年），松赞干布派使臣禄东赞到长安通聘，要求与唐公主成婚，永结和好。阎立本的《步辇图》就是描绘太宗召见禄东赞的场面：右边太宗坐在步辇上（辇是用人力抬、扛或举的一种出行工具，在唐代主要为皇族所用），前后由众宫女抬护拥随，威严中略显几份喜悦；左边的禄东赞由典礼官（穿红衣者）导引谒见，敬仰中带有的一些拘谨。画家把不同地位、身份和民族的人物表情刻画得真实得体。

6. 唐蕃会盟碑

唐朝前期，吐蕃在接受唐政府的册封（凡新赞普继位，须获得唐天子的册命）的同时，仍不时向外扩张，高宗、武则天时期，吐蕃势力进入西域地区。“安史之乱”以后，唐朝对西域的控制大为削弱，吐蕃乘机攻占河西、陇右及西域大部分地区。广德元年（763年）吐蕃一度攻入长安。9世纪初，吐蕃的国力日趋衰弱，国内主和派的意见占据上风，认为当与唐朝重新修好。其时，唐朝也采取联合回鹘、南诏，孤立吐蕃的策略。由于内外局势的变化，吐蕃在经过了好几次会盟、败盟之后，最终要求与唐朝重新议界讲和。唐长庆元年到二年（821—822年），双方举行会盟，历称“长庆会盟”。会盟的仪式分别在长安、逻些举行，并于823年立唐蕃会盟碑于拉萨大昭寺前。

唐蕃会盟碑，俗称“长庆碑”，又称“长庆舅甥会盟碑”，藏语名称“祖拉康多仁”，意为“大昭寺前之碑”。此碑由碑座、碑身和碑首三部分组成。碑首为四坡平顶，上置一莲座宝珠。碑首下部四周边缘雕刻有排列疏密匀称的升云图案。碑座为龟趺座，由一块整石雕刻而成。下为长方形

底座,上伏一卧龟,头部微露,四肢收拢,造型古朴生动。碑身为长方形截面柱形,石碑正面向西,上刻汉藏两体对照文字,文义相同,为同一盟约。左半藏文横书,字迹苍古,具有吐蕃时期藏文特点;右半汉文直书,字体为正楷。碑背面为藏文盟辞,碑左侧刻唐廷参与此次会盟的官员人名位次(共有18人),碑的右侧为吐蕃一方参与会盟官员的职衔、姓氏等,并有对应音译汉文。碑文对研究吐蕃姓氏、当时藏汉对音和吐蕃时期的官制、宗教及政治文化,是极为宝贵的资料。

唐蕃会盟碑是吐蕃时期汉、藏人民情深谊厚、友好相处的历史见证,虽历经1000多年风雨剥蚀,文字仍能辨认。盟约规定:彼此不为寇敌,不举兵变,不相侵谋边境,不相掠夺人口,双方社稷协同如一。表达了汉藏两族“欢好之念永未断绝”,“舅甥二主,商议社稷如一,结立大和盟约,永无渝替”。会盟以后,两族人民的友好往来与经济文化交流更为频繁密切,为13世纪西藏正式划入中国版图打下了基础。拉萨人民极为重视这一宝贵历史文物,在碑的周围砌筑了围墙以防止人为的破坏。1985年5月,西藏自治区政府及有关单位清理了长期埋在地下的碑座,并采取了相应的保护措施。

7. 唐代的中外文化交流

隋唐,是两汉以后中国历史上的又一个鼎盛时期,政治上,国家统治机构完备,各项制度严密;经济上,生产发展,商业兴盛;文化高度繁荣,文学艺术绚丽多彩。国家的强盛和文化的高度发展,使得唐朝的统治者和普通民众都具有强烈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养成一种敢于对外开放,勇于向外学习的心态;同时,强盛和高度发展的隋唐王朝文化也向外辐射,许多国家派出了使节与唐朝建立友好关系。唐中央政府的鸿胪寺、礼宾院就是专门负责接待到长安的少数民族首领和外国使节的机构,这些机构还配备通晓各种语言的“译语掌客”(翻译人员),便于彼此的语言交流。

据史书记载,曾与唐王朝交往的国家和地区有300多个,主要分布在东亚、南亚、中亚和西亚地区。东亚的日本、高丽、新罗、百济与唐朝的往来相当频繁。唐初,朝鲜半岛仍然处于高丽、新罗、百济三国鼎立时期。唐建立后,三国都曾遣使和唐朝来往。当时输入的商品主要有牛、马、布匹、纸、笔、折扇等,输出的有丝绸、茶叶、陶瓷、药材、书籍等。660年,唐派军队攻灭百济。668年,唐军又攻入高丽都城平壤。唯与新罗一直保持着友好往来,新罗也吸取、仿效唐制来改革其政治制度。隋唐时期,日本国内掀起一个学习中国文化的高潮,双方的交往也得到空前的发展。唐时,有确切记载的日本派出的“遣唐使”共有13批,唐朝廷和地方镇将派出的赴日使节共有8批。随同日本使团来唐的还有大量的留学生和学问僧,他们学成归国,对日本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发展起到重大的影响。南亚地区的林邑(今越南中部)、真腊(今柬埔寨)、室利佛逝(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堕婆登(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尼婆罗(今尼泊尔)、诃陵(今印度尼西亚爪哇)以及狮子国(今斯里兰卡)等,在唐前期就曾派使臣来访。到唐代后期,骠国(今缅甸)又通过南诏与唐朝往来。天竺(今印度)当时分为东、南、西、北、中五天竺,贞观年间就多次遣使唐朝,唐太宗时也派出使臣出访天竺。中亚、西亚与唐朝建立友好关系的有吐火罗(今阿富汗)、波斯(今伊朗)、大食(哈里发帝国或伊斯兰教帝国)、拂菻(东罗马帝国)等。吐火罗以产汗血马著名,

是丝绸之路南路的必经之地，吐火罗与唐朝的交往较为密切，赠送的物品有鸵鸟、玛瑙灯树、名马、异药、红玻璃等。波斯也多次遣使唐朝，赠送的东西有玛瑙床、真珠、药物等，唐还从波斯引进了菠菜，马球也是从波斯传入的。许多波斯商人在长安经商，波斯名酒三勒酒很受唐人欢迎，波斯商人在长安、洛阳直接酿造出售。中国的丝绸、工艺品和书籍则大量输往波斯。

当时在长安逗留，或长期居住的外国人极多，有中亚的艺人、日本的遣唐使、天竺的高僧等，他们有的来此观光学习，有的从商营利，还有的在唐政府供职。比如，波斯人李元谅（即骆之光）因平定朱泚之乱有功，被留任皇室宿卫；天竺人瞿昙氏，祖孙几代服务于唐朝司天台；高丽人泉男生、日本人阿倍仲麻吕都是学问僧，后来都在长安唐朝政府任职。唐朝政府还专门设立了“宾贡科”，考试对象是外国留学生。如大食人李彦升在宣宗时，以进士及第而留在朝廷为官，诗人李珣是波斯人的后裔，在唐末参加过科举考试。唐代的长安城不仅是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还是一个开放性的国际文化交流中心。

8. 玄奘

玄奘，俗姓陈，法号玄奘。生于602年（一说600年），洛州缑氏（今河南偃师缑氏镇附近）人。他的父亲陈惠曾做过隋朝江陵县令，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陈惠有4个儿子，老二（玄奘之二哥）陈素在洛阳净土寺出家。玄奘10岁时，父亲去世。次年，他由二哥带到洛阳，因常随兄长听高僧讲经说法，而萌生了出家的想法。13岁时，玄奘在洛阳净土寺出家为僧，18岁与二哥一同来到长安。隋朝末年，长安城残破不堪，城内的讲经场所早已不见人影了。各地的高僧和研究佛学的学者，大都集中在当时战争尚未波及的四川，于是，他俩又离开长安，来到成都，在成都空慧寺拜师学经，潜心研究，学业大进。23岁时，为追求更高的目标，玄奘离开成都，先后在荆州、赵州、相州等地遍访名僧。不久，他重新回到长安，向法常、僧辩两位大师学习。两位大师对玄奘极为赏识，赞许他为佛门的“千里驹”。

随着学习研讨的深入，玄奘发现国内的佛教经论体系杂乱，对教理的解释也众说纷纭；传入的佛教经典甚少，典籍的翻译又差错较多。自己虽读遍经典，遍访名师，但仍是“莫知适从”。要弄清楚佛教的教理，必须亲自到它的发源地——印度去学习，这样方能求得“真义”。唐初，西北边塞局势不稳，政府不允许人们擅自流动。法律规定，凡需越度关塞要津，须向政府申请取得“过所（通行证）”。玄奘等上表向朝廷申请，但未获批准。贞观元年（627年，一说为贞观三年），长安闹饥荒，朝廷同意僧侣外出就食，玄奘乘机离开长安，私自跟随一些商人向西出发。经秦州（今甘肃天水）、兰州、凉州（今甘肃武威），然后出玉门关。唐初，西行之路有南北二道，玄奘选择北道：由天山南麓过葱岭（南路由昆仑山北麓向西过葱岭）。出玉门关后，向导借故离他而去，玄奘孤身一人骑马穿越莫贺延碛（今安西到哈密的沙漠地带），莫贺延碛长八百余里，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黄沙漫漫，无边无际。玄奘只得追寻路上的白骨和驼马粪迹前行。一天，他迷失了方向，身体又极度困乏，便下马取皮囊饮水，不料一时失手，一皮囊的水全部倾覆。他懊丧无奈，只得往回取水，东行了十余里，忽然想到自己曾发誓，若不到天竺，决不向东后退一步，宁可西进而死，决不东归以生。于是，立刻勒转马头西行，一连走了五天四夜，终因眼枯唇焦、喉痛腹燥，人马一齐倒卧

在沙石上。半夜苏醒后，幸得识途的老马把他带到池塘边，才摆脱了险境。出了大沙漠，玄奘经过伊吾（今哈密）、高昌国（今吐鲁番）、阿耨尼（今焉耆）、层支（今库车），经凌山（今天山山脉的腾格里山穆索尔岭），转道中亚地区，再翻越大雪山（今阿富汗的兴都库什山）、黑岭（又名黑山，泛指兴都库什山南面的大岭），终于进入北印度。此时，玄奘离开长安长途跋涉已将近一年。

唐时的印度分为东、西、南、北、中五部，玄奘进入北印度之后，瞻仰各地的佛教圣迹，随到之处虚心求学，足迹遍及北印度、中印度的40余国。贞观五年（631年），玄奘来到中印度的达伽耶城（今印度比哈尔邦加雅城），达伽耶城的那烂陀寺是当时印度最大的寺院，也是佛教的最高学府，主持法师戒贤这时年逾百岁，已不讲学。当他问明玄奘西行的目的之后，深为感动，破例主讲了佛学经典《瑜伽论》以及因明（形式逻辑学）、声明（音韵学）等学问。玄奘在那烂陀寺学习了5年后，又到南印度等地去游学，6年后再次回到那烂陀寺时，玄奘的学术已经达到了极高的水平。贞观十六年（641年），在羯若鞠国的首府曲女城（今印度北方邦坎诺吉城）举行规模盛大的学术辩论会，参加大会的有全印度18个国家的高僧、僧众以及其他教派僧人六七千人，前来观礼的更是人山人海，大家推玄奘为论主（主讲人）。玄奘把所论的主题抄写了一本册子挂在会场门口，征求辩论，并声明：如果这篇论文中有一个字没有道理，能够被驳倒，当斩首相谢。会上有少数几个学者提出了疑问，玄奘释疑解答，此后再也没有人提出问题。大会持续了18天，仍没有人出来反驳，最后宣告玄奘辩论胜利。按惯例，获胜者当骑象游行一周，玄奘推辞不过，只得尊重当地的风俗。僧众们前呼后拥，高呼：“支那国法师立大乘义，破诸异见。自十八日来无人敢论者，普宜知之。”当时全场欢呼，焚香散花，并授予玄奘荣誉称号。从此，玄奘名声传遍印度，几乎家喻户晓。

曲女城大会结束后不久，玄奘就决定启程回国。贞观十七年（643年），玄奘谢绝了戒日王（羯若鞠国国王）的赠赐，只带上多年搜集的佛经、佛像以及中亚、南亚特产的奇花异草的种子离开了印度。回程时，他改走天山南路，一路上因有戒日王的通行文书，很顺利地到达了于阗。当年玄奘是违犯禁令出国的，而今虽然功成名就，但如何获得朝廷的谅解呢？玄奘在于阗写了一道委婉的表文，说明自己当年去印度的缘由，并自请在于阗待命，听候处理。表文送至长安，递交中书省上呈唐太宗。唐太宗看了玄奘的表文，高兴地亲自写了敕文，令玄奘“速来与朕相见”，并“敕于阗等道，使诸国送师（玄奘），人力鞍乘，应不少乏”。贞观十九年（645年），已经46岁的玄奘回到了阔别近20年的长安。

玄奘回到长安，受到朝野僧俗的热烈欢迎，“近京之日，空城出观”。在长安朱雀街上陈列了玄奘带回的佛经、佛像等物件，据说观看的民众排成好几十里的队伍。不久，唐太宗在洛阳召见了玄奘，并劝他还俗做官，玄奘婉言谢绝，表示决心献身于佛经的翻译事业。回国3个月后，玄奘回到长安的弘福寺，开始大规模的佛教典籍翻译工作，后来，又选慈恩寺、西明寺、玉华寺等作译场。为了收藏保存从国外带回的经典、佛像等，玄奘特地在慈恩寺的西院建造了一座大雁塔。麟德元年（664年）二月，玄奘在长安郊外的玉华寺圆寂。从回国后直到逝世，19年间，玄奘共主持翻译佛教经、论达74部（一作75部）、1335卷、1300多万字，比我国早期的著名高僧鸠摩罗什、真谛、不空3人翻译的佛教典籍总和还多600多卷，这是经译事业上的划时代的大事，开创了我国古代译经史上的极盛时代。玄奘又口述他的所见所闻，由门徒辩机记录成《大唐西域记》一书。

他还将《老子》《大乘起信论》译成梵文，传布于印度。玄奘还向国内学术界介绍印度的因明学，以推进中国逻辑学的发展。玄奘的一生不仅为繁荣佛学文化作出了杰出的贡献，“玄奘西行”还直接沟通了唐与中亚、西亚和南亚的联系，成为中印友好的历史象征。

玄奘圆寂后，安葬仪式在长安城的白鹿原（即霸上）举行。669年，唐高宗下令把玄奘的遗骨迁葬到樊川北原（今陕西西安南郊），并在那里造了塔和寺。到了唐朝末年，收藏玄奘遗骸的塔遭毁损。宋端拱元年（988年），政可和尚在终南山（道教名山，位于陕西西安南）的紫阁寺找到玄奘的顶骨，于宋天圣五年（1027年）送到南京长干寺东冈塔收藏。明洪武十九年（1386年），顶骨又被移到南冈三塔之上，以后就淹没无闻了。直到1942年才于南京中华门外的一座小山丘里，发现了收藏玄奘顶骨的石函，内藏他一部分遗骨，现保存在南京历史博物馆，留为永久的纪念。

9. 《大唐西域记》

玄奘回到长安后，唐太宗在洛阳召见了她，并对她说“佛国遐远，灵迹法教，前史不能委详，师既亲睹，宜修一传，以示未闻”，要玄奘将其所见所闻著录成书。不久，玄奘自己口述，弟子辩机笔录，花了一年多时间将西域的见闻写成《大唐西域记》一书。《大唐西域记》共12卷，10万余字，于贞观二十年（646年）成书。该书记载了玄奘离开高昌以后的行迹，以及他在近20年的旅行中所亲历或听闻的138个国家和地区的情况，包括今中国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以及中亚各国、阿富汗、伊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孟加拉、斯里兰卡等，内容涉及地理形势、水陆交通、气候物产、风土民情、历史文化、经济生活、宗教信仰等。其中有许多内容都是新旧《唐史》所未载的，是研究古代中亚、南亚的重要历史资料。《大唐西域记》一向为国际学者所重视，19世纪后期先后出版了法文和英文的译本，20世纪初期又出版了英文的重译本和日文的译注本。世界各国学者，尤其是东亚和中南亚的学者从语言、民族、历史、地理、宗教等方面对《大唐西域记》做了深入的研究。还有近现代的考古学者，依据《大唐西域记》的记载，从事古代文化遗址的探测和考古发掘工作。其中最著名的是那烂陀寺遗址的考古发掘。那烂陀寺在十二三世纪的战火中被夷为平地，1915年，印度考古学家就是根据《大唐西域记》的记载进行勘察发掘的。

10. 鉴真东渡

鉴真（688—763年），俗姓淳于，鉴真为他的法号，扬州江阳县（今江苏扬州）人。他父亲是位虔诚的佛教居士，经常到扬州大云寺参禅拜佛。鉴真14岁（一说16岁）时，随父亲去大云寺拜佛，为佛像庄重慈祥的造型所感动，随即向父亲提出要求出家为僧。于是，在征得大云寺智满禅师的同意后，鉴真在大云寺出了家。两年的刻苦学习后，他又随大云寺的道岸禅师到洛阳、长安游学。鉴真聪明好学，矢志不移，很快成为一名律宗（佛教的一个派别）的后起之秀。他不仅研习佛学，在建筑、医药、艺术等方面也有很高的造诣。713年，26岁的鉴真回到了扬州，在大明寺讲律传法。733年，道岸的另一位弟子义威圆寂之后，鉴真成为这一地区的佛教“宗首”，他讲佛写

经、剃度僧尼、修寺造佛，还从事救济贫民的活动。此后，他传授戒律达4万多人，遂成为江北淮南地区的著名高僧。

佛教6世纪传入日本，开始在社会上层流传。大化改新以后，民众为了“规避课役”而“自度”“私度”为僧的极多，政府感到难以控制。而且一入佛门就可不必负担政府的赋税，政府的财政收入受到影响。针对这一问题，遣唐学问僧在唐朝找到了解决的方法，即实行受戒制度，请著名法师主持仪式，通过考试来确定受戒的资格。当时，日本虽有佛法，但没有僧人剃度必要的手续，也缺少适合授戒的名僧。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日本元兴寺隆尊提出向唐朝聘请戒师的建议，得到政府的支持。开元二十一年(733年)，日本学问僧荣睿、普照随遣唐使团来到中国，他们在长安学习10年，其间，受政府的委托，他们一直在物色合适的名僧。中国僧人道璇曾应召前往日本，但终因能力和威望的限制不能获得日本方面的满意。天宝元年(742年)，已在唐朝完成学业的日本僧容睿、普照到扬州大明寺拜访鉴真。他俩请求鉴真去日本弘法。鉴真见他们辞义恳切，便欣然应允。

当时，从唐朝去日本的航路是相当艰险的，由于造船和航海技术的局限，从扬州东越大洋的航路上经常发生船毁人亡的事件。唐朝政府对私自出国限制甚严，没有获准而私自出国将受到法律制裁。鉴真深知东渡传律的艰难，但他态度坚决，说：“是为佛事也，何惜身命？诸人不去，我即去耳。”他的决心感动了诸弟子，祥彦等21人当即表示愿意同行。从742年起，鉴真前后4次东渡失败。748年，鉴真率众僧、水手等一行30人自扬州出发，出长江口后即遇大风，船只失去控制，随风漂泊至海南岛的振州，第五次东渡又失败。鉴真一行在当地居住了一年之后重返扬州，一路上困苦劳累，荣睿、祥彦先后病死，普照离鉴真北去，鉴真本人也因辛劳过度而感暑热，双目失明。回到扬州后，鉴真又着手准备第六次东渡。753年，鉴真搭乘日本遣唐使船，于次年1月到达萨摩国阿多郡秋妻屋浦(今鹿儿岛川边郡坊津町秋目)，第六次东渡终于成功。一个多月后，鉴真一行到达日本首都平城京(今奈良)，受到朝野的盛大欢迎。

鉴真到达日本以后，在东大寺设立戒坛，首先为天皇、皇后、太子及公卿以下官员400多人授戒，从这以后，日本无论什么人，如果没有经过指定的戒坛受戒，就不能取得僧籍。同时，鉴真宣教传律，为律宗在日本传布奠定了基础，被尊为日本律宗初祖。此外，鉴真及其弟子在建筑、艺术、医学等方面，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日本天皇曾将备前国(今冈山县)垦田一百町(一町为一公顷)赐予鉴真，鉴真在那里设计并领导建造了一座新寺院，叫唐招提寺。唐招提寺建筑群，现为日本奈良市(古平城京所在地)的著名佛寺，整个建筑和寺内的许多佛像，都是鉴真及其弟子的杰作。当时建成的有金堂(大殿)、讲堂、东塔等，整个建筑气势雄伟，结构精巧，具有浓厚的盛唐建筑风格，对日本的佛教寺院建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鉴真还是一位医学和药物学家，他为日本皇太后治愈了疑难病症，他虽然双目失明，但凭着自己的嗅觉鉴别草药，传授中医知识，留有《鉴真上人秘方》一卷(据说是鉴真的处方记录)，为日本医学界所推崇，十七八世纪时，在日本药店的药袋上，还印着鉴真的图像。鉴真随船带到日本的还有绣像、画像、书法等，对日本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763年，为传播佛法奋斗了一生的鉴真，在唐招提寺内圆寂，终年76岁，遗体经火化后被安葬在寺后的松林中。

11. 鉴真坐像

763年,鉴真开始患病,弟子忍基等为他造肖像。肖像按鉴真的真容所塑,高约80厘米。塑像中的鉴真结跏趺坐(佛教徒的一种坐法),双目紧闭,神志安详,栩栩如生。鉴真塑像现供奉在日本奈良市的唐招提寺内,被视为日本国宝。

鉴真坐像的制作技术采用由鉴真传入日本的“干漆法”工艺,这一工艺后在日本得到推广并发扬光大。干漆法,又称夹纻法。其制作方法是:先用泥沙混合制成原料,外面以苧麻(布)、丝、棕等裱裹之后涂漆,如此反复裹涂多次,最后在塑像上绘彩描金,并将原胎抽去。干漆法工艺萌芽于战国时期,当时已有以苧麻为胎骨的漆器。东汉时佛教大盛,始有用干漆法制作的佛像。隋唐时期的干漆法工艺已相当成熟,也多用于佛像制作。干漆法的佛像制作费时费工,价格昂贵,据说,一尊干漆法制的佛像价格要比铜制的高出10倍。现藏于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唐代坐佛像,以及今河南洛阳白马寺内的释迦牟尼、阿弥陀佛以及十八罗汉像,均是元明时期干漆法制作的佛教造像,时间上虽较唐代为迟,但亦弥足珍贵。

12. 遣唐使

中日两国之间的交往,早在汉代已经开始,日本接受中国文化最初是通过朝鲜半岛。不久,这种间接、自然而缓慢的文化交流,越来越不能满足日本人民的需要了。607年,日本圣德太子开始派遣遣隋使,小野妹子等遣隋使,由百济使节陪同,于大业四年(608年)到达大兴。遣隋使中有僧人、学生等,他们有的在中国学习了二三十年,对中国文化、制度有深刻的了解。由于他们的活动,中国文化在日本的影响进一步加深。

遣唐使在日本史书中被称为“遣大唐大使”“西海使”或“入唐使”。唐帝国方面,对其则与一切其他国家的使节相同,称其为“朝贡使”。623年,自唐回国的留学僧惠齐、惠光等上奏日本朝廷,说在唐的留学者均已学业有成,应予召回,同时建议朝廷能经常向唐派遣使团。日本朝廷接受了这个建议,经过一系列的准备,终于在7年之后,即630年派出了第一批遣唐使。在此后的264年中,日本共任命遣唐使18次。其中有3次未能成行,实际到达中国的有15次。15次中,1次是迎入唐大使,1次是送唐客大使,所以,真正意义上的遣唐使有13次。

初唐时,遣唐使团规模都比较小,通常只有两条船,人员不超过250人,组织也不甚严密。中唐以后,遣唐使团的规模逐渐扩大,阵容整齐,一般有四条船,五六百人(第8次遣唐使人数为594,第13次遣唐使计划的人数达651,但载有140人的第三船在出发时遇难而未入唐),使团中的各色人等配备整齐。遣唐使是代表国家到斯文之乡中国的外交人员,故日本政府对使团官员的选拔是谨慎严格的,除了具有外交才能之外,要有堂皇的仪表、优雅的风度,还要具备有关中国的知识和礼仪方面的修养。遣唐使团中,除了有大使、副使等正式官员外,还配有知乘船事(船长)、造船都匠(造船技术负责人)、译语(翻译)、主神(掌祭神者)、医师、画师、史生(文书)、射手(警卫)、船师(航海长)、音声长(乐队负责人)、音声生(乐手)、卜者(掌航行方位、测定风力者)、杂

使(杂役)、玉生(玉匠)、铸生、细工生(手工艺品匠人)、水手长、水手等,有的使团还配有围棋高手、琵琶演奏家等,以满足国际社交的需要,遣唐使团还负责送留学生和留学僧。

在任命遣唐使的同时,政府开始为使团建造船只。出发前,先要做各种祭神和拜朝的仪式。遣唐使团的船只到达靠岸后,先是受到唐地方政府官员的迎接,并被安排食宿。同时,其行程被报朝廷,使团根据朝廷的指示,限定人数,乘船进京。入长安前,先在城外的长乐驿住一两日,接着在内使引导下乘马入长安城,居四方馆。住下以后,遣唐使团通过监使向唐政府进上贡物,先由唐官员与使节会面,然后,使节到麟德殿谒见皇帝。此时,使节可以提出希望和要求,一般都是“所请并允”,后赐宴、授爵。遣唐使在完成使命回国前,唐政府对此次朝贡进行答赐,朝廷举行送别宴会,最后遣内使将其送至登船地点,有时甚至派专使将其送回日本。

遣唐使的成员回国以后,一般都受到日本政府的重用,很多人做了朝廷或地方的官员。他们在任职期间,把在唐朝所见所闻的各种政治、经济制度推广到日本。日本历史上著名的大化改新,就是在留唐学生的协助下进行的。大化改新时颁布的班田制、租庸调制与唐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大体类似。《大宝律令》则是以《唐律》为蓝本制订的。在官制方面,日本也仿照唐制,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完整的官制系统。在文化上,日本的文学、史学、书法、绘画等方面都受到唐文化的显著影响。在城市建设方面,日本从7世纪末到8世纪末建造的3个都城:藤原京(建于694年,位于今奈良)、平城京(建于708年)和平安京(今京都),都是模仿唐都长安规划营造的。平安京与长安一样,也有朱雀大街、东西两市等。京城里宫殿、寺院和官衙以及民居建筑,也完全模仿唐朝的样式。

8世纪中叶,唐朝发生了“安史之乱”,国力日渐衰落。9世纪时的唐朝,内乱不已,逐渐失去了对周边国家的吸引力。894年,宇多天皇任命菅原道真为遣唐大使,但菅原道真以“大唐凋敝”为由上书天皇,力陈停止派遣遣唐使的理由。此时,日本政府也因财政拮据而难以支持庞大的使团费用,遂同意菅原道真的建议。至此,唐朝与日本的官方交流暂告中断。

13. 吉备真备

吉备真备(695—775年),原姓下道朝臣,相传其祖先是孝灵天皇的皇子,世居吉备国(今冈山、兵库一带)。约15岁时,吉备真备进入大学寮学习。22岁时,被选拔为遣唐留学生。717年,随第八次遣唐使团入唐学习。吉备真备博学多才,在唐学习时,经、史、刑、算术、天文、历法、书法、音乐等无不精通。他多才多艺,后人由此演义出许多传奇故事。如《扶桑略记》中说,吉备真备才智过人,大唐十分爱惜,不肯让他回国。吉备真备只得秘“封”日月,致使十日之内,天下时辰“怪动”。《江谈抄》中说,大唐为了阻止他回国,设计为难他,而吉备真备在鬼魂的帮助下,一夜之间学会了围棋,一夜之间学通《文选》等。735年,吉备真备学成回国,他向日本朝廷献上的物品有:《唐礼》130卷、《太衍历经》1卷、《太衍历立成》12卷、《东观汉记》133卷、《乐书要录》10卷,以及测影铁尺1枚、铜律管1部、弦缠漆角弓1张、马上饮水漆角弓1张等。这些被带回的典籍和物品,对日本的文化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如《唐礼》对日本朝廷礼仪的改革产生很大的影响;《太衍历经》和《太衍历立成》促进了日本的历法改革;《乐书要录》和他带回去的乐器,对于唐乐在

日本的传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八、参考书目

1. 吕思勉著：《隋唐五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2. 王仲荦著：《隋唐五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3. 向达著：《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1957年版。
4. [美]谢弗著：《唐代的外来文明》，吴玉贵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5. 方豪著：《中西交通史》，岳麓书社，1987年版。
6. 武安隆著：《遣唐使》，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